

□ 《上海经济增长趋势与预测分析》课题组

上海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与1998年预测*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所寻求的最为重要的政策目标。经过80年代中期后的中低速增长徘徊,上海终于在1992年及以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其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实现13—14.9%的增长速度。根据我们的预测,今年上海GDP的增长速度仍将达到12.6%左右。现在的问题是,1998年上海将保持怎样的增长态势?同时,上海应确立怎样的增长目标才符合上海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从上海经济增长的周期形态上看,若我们将1990年3.5%的GDP增速作为本次增长周期的起点,将1993年14.9%的GDP增速作为本次增长周期的波峰,则循1996年开始出现的增速下降惯性(GDP增速1995年为14.1%,1996年为13%,1997年预计为12.6%),1998年似乎还存在增长速度继续下降的可能性,为了能科学、准确地认识和把握1998年上海经济增长的态势,上海财经大学与上海统计局联合组成了“上海经济增长趋势与预测分析”课题组,拟通过建立数量分析模型的方式,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轨迹进行模拟,同时结合经济变量变化的实证分析,来预测1998年上海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形势,供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作为决策参考。

科学的增长预测,应建立在长期增长趋势的规律性分析基础上,以未来与当前和过去存在一定的联系性为依据,同时考虑外生环境参数变化的影响。为此,我们以1978年以来的经济统计数据作为数量分析的样本,采用国际通行的数量分析模型对以往的增长过程进行模拟,在拟合程度相当高的基础上,对1998年的经济增长与相关参数进行了预测,得出了有关1998年上海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测指标体系。同时,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对以往上海经济长期增长的过程中,决定和影响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形成了一批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决策型参数,以此来帮助说明实现预测增长的条件。

一、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影响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1978年以来的18年中,上海的GDP以9.3%的平均增长速度递增,略低于全国同期9.8%的增长速度。其间,大致经历了三大增长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1年,上海GDP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第二阶段是1982年到1991年,上海GDP的增长速度在10年中每年都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在此期间,全国的年平均递增速度达

本文为上海财经大学1997年预研究重点课题。执笔:孙海鸣;课题组成员:孙海鸣、蔡旭初、姜国麟、朱章海、朱平芳、张人骥、熊礼生、吴维扬、施祖辉、干春晖、陈学彬、刘洪、严军、刘乃全、钱文璞、张庆华、马晓敏。

9.28%，而上海只有 7.36%；第三阶段为 1992 年以后，上海 GDP 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具体参见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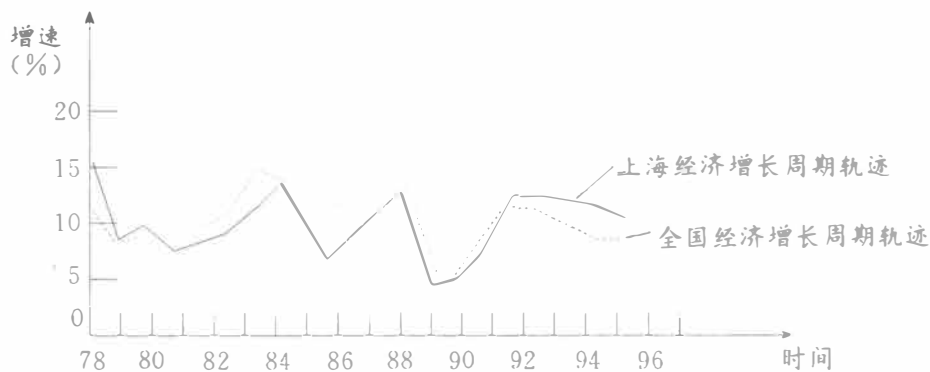
表一 1978 年以来，上海 GDP 增长速度与全国同期增长速度对照比较

年 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上海 GDP 增速%	15.8	7.4	8.4	5.6	7.2	7.8	11.6	13.4	4.4	7.5
全国 GDP 增速%	11.7	7.6	7.8	4.4	8.8	10.4	15.2	13.5	8.8	11.6
上海速度与 全国速度差距	4.1	-0.2	0.6	1.2	-1.6	-2.6	-3.6	-0.1	-4.4	-4.1

年 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上海 GDP 增速%	10.1	3.0	3.5	7.1	14.8	14.9	14.3	14.1	13.0
全国 GDP 增速%	11.3	4.1	3.8	9.3	14.2	13.5	11.8	10.2	9.8
上海速度与 全国速度差距	-1.2	-1.1	-0.3	-2.2	0.6	1.4	2.5	3.9	3.2

80 年代经济增长的颓势，使上海在全国中的经济地位逐年下降。在 1980—1989 年期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 6.9% 降为 3.8%；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11.6% 降为 7.2%；外贸出口总值比重从 23.3% 降为 8.3%；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从 8.0% 降为 4.2%；财政收入比重从占全国 1/6 降为 1/10。90 年代的高速增长，使上海 GDP 占全国的比重在 1996 年恢复到 4.3% 左右。

90 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阶段中，上海同全国一样，大致经历了 2.5 个增长周期循环，即从 1978 年的高速增长波峰开始下降，到 1981 年达到增速谷底，然后增速上升，分别在 1984 年和 1985 年达到 80 年代第一个周期的波峰，然后在 1986 年进入该周期的谷底。在这个周期中，上海的波峰与谷底的落差为 7.8—9 个百分点；全国的波峰与谷底落差为 6.4—10.8 个百分点。1986—1990 的增长周期中，上海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波峰与谷底落差为 5.7—7.1 个百分点；全国同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波峰与谷底落差为 2.5—8.8 个百分点。参见下图：



从同期波动的数据和形态上看，90 年代前上海增长波动的时间长度和复苏、繁荣、衰退过程，与全国基本是一致的，这说明，在这一阶段中，在推动增长的因素和影响增速下降的因素方面，上海与全国基本承受着相同或相似的作用力。上海与全国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达到周期波峰在时间上滞后，上海通常比全国迟一年；二是波峰时增速比全国要低 1.5—

1.8个百分点;三是增速从波峰降到谷底的速率比全国快得多,全国平均用两年,而上海通常只用一年。以上差异显示,90年代前,上海经济体系对外部增长信号出现的敏感性与内部推动增长的能力,不如全国平均水平充足;而对外部宏观环境出现的调整增速信号的敏感性,及诱使增速下降的内部制约力,却比全国平均水平充足。由此可见,90年代前,上海经济体系推动增长各类结构,在全国中并未享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地位。若与远快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中国沿海地区相比,其竞争弱勢的差距就更加显著。

9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波动,上海与全国相比出现了如下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第一,增长速度开始快于全国平均水平,1991—1996年上海增速年均递增14.53%,全国同期则只有12.73%;1992—1996年期间,增速差距还有拉大的趋势。第二,面对相同的宏观经济信号,全国经济在1992年达到14.2%的增长波峰后开始下滑,到1995年时增速下降了4个百分点;而上海经济却在1992—1995年中,连续4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4.1—14.9%之间,筑起了一个高位增长的平台,直到1996年才开始进入下降通道,而此时,全国增速的边际下降率却已只有0.4个百分点,显示出开始探寻增速周期谷底的趋向。这样的增长轨迹,与90年代前上海经济周期变化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显示出,1990年后的上海经济体系,对外部出现增长信号的敏感性与内部推动增长的能力,已开始达到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际上,当全国在1990年达到上一个周期增速谷底时,上海在1990年的增速已比1989年高0.5个百分点);而面对宏观经济出现的调整信号,上海经济体系内部的持续增长能力或抗下降能力已大大提高。由此可见,90年代后,上海经济推动增长的因素已不同于全国总体推动增长的因素,而由这些新增长因素组成的增长结构,在全国中开始享有了比较竞争优势的地位。

比较80年代与90年代后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也许有助于说明上海推动增长与持续增长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原因。在80年代,上海同全国一样,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第二产业。根据我们对1980—1989年上海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弹性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得出:在这10年中,GDP每增长1%,第一产业的贡献是0.044%,第二产业的贡献是0.7367%,第三产业的贡献是0.2215%。其中,工业增速与GDP增速的相关性高达0.994,而第三产业增速与GDP增速的相关性仅为0.7733,工业对80年代上海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相当显著。我们因此而可以说,80年代上海经济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是工业诱发上海GDP高速增长的能力相对不足,其周期循环亦由工业增长波动引致。

在整个80年代,上海工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并不缺乏要素投入。虽然上海经济因GDP净流出原因而仅使用了同期GDP的76%,但有限的投资依然主要投在工业中。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71.8%和62.5%都投在第二产业,投在第三产业的分别仅占26.5%和36.2%;同时,第二产业所拥有的劳动力比重,从1980年的48%上升到1989年的60%,第三产业所拥有的劳动力比重,从1980年的22.1%上升到1989年的28.4%,也就是说,从第一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中,2/3进入了第二产业。这样,导致上海工业难以带动上海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只能归咎于工业自身的竞争力。

造成工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除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滞后影响竞争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一,工业技术进步缓慢。根据我们对1978—1992年的样本测算,在第二产业的增长中,资本的贡献达75.7%,劳动的贡献达18.7%,技术进步的贡献

仅为 5.6%。这个技术进步指标低于 1952—1960 年期间的 9.7% 和 1963—1978 年期间的 11.2%。第二、第三产业支持不足。80 年代中后期,计划分配体制逐渐解体,上海工业因缺乏贸易、金融、信息和服务部门的有效配合,其发展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主要表现在企业原料、资金筹集难度增大,产品销售发生困难。在“七五”期间,上海的库存占 GDP 的比重达到 15.8%,比“六五”上升了 4.6 个百分点。尽管此时工业投资占 GDP 的比重达 29.4%,比“六五”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但其所支撑的 GDP 增速,从“六五”的 9.1% 下跌至 5.7%。

第三产业,特别是为工业生产提供直接服务的第三产业,因其具有替代计划体制的功能而具有直接生产的属性。因而,在市场经济中,重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性并形成合理的比例,就成为降低工业因改革而产生的各类交易成本的关键。否则,工业将会过早进入总规模收益递减或总成本上升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上海从 90 年代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并实施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的“三、二、一”产业序列发展方针,力求使上海的第三产业,不仅服务于上海工业,而且服务于全国工业甚至亚太经济。在城市功能定位上,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中心,转变为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浦东开发、开放,实际成为实施增长转型战略的手段。同时,在工业中,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以技术进步快和市场竞争能力强为筛选原则,重点发展钢铁、石化、通讯、电站、家电、汽车等六大支柱,以重新确立上海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

这一增长方式的提出与实施,由于符合全国市场化改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市场新机会,很快被国内外投资者所认同。其首先收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是,大量外部投入迅速进入上海,使上海很快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净流出的局面。在整个 80 年代,上海 GDP 净流出占同期 GDP 生产额的 24%，“六五”时期曾高达 42%。净流出的最大弊端是削弱了上海的消费与投资能力。

从 1994 年开始,上海首次出现了 GDP 净流入,然后连续三年呈增长态势,1996 年净流入达 326 亿元。整个“八五”期间,上海 GDP 净流出仅占同期 GDP 的 2.2%,远低于 80 年代的 24%。实际上,整个“八五”期间,上海净财政流出(解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强度与 80 年代并无大的变化,5 年总额仍高达 1733.7 亿元,占同期 GDP 的 21.8%。问题的关键是 80 年代外部资本进入少而无法抵补。“八五”期间上海财政净流出与实际净流出比重 19.6 个百分点的差额,实际是由外部资本进入来抵补的。在这里,外资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八五”期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换算成人民币,大约在 1290 亿元左右,相当于同期 GDP 的 16.2%。外资进入,大约抵补了财政净流出 GDP 的 75%;同期,国内资本进入,大约抵补了财政净流出 GDP 的 15%。参见下表:

表二 GDP 净流出与外资引入关系表

单位:亿元

年 份	1981	1985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上海实际利用 外资数额(美元)	0.18	1.15	8.66	22.38	31.75	38.89	52.98	75.10
上海 GDP 净流 出额(人民币)	+164.13	+122.47	+167.68	+150.12	+91.79	-53.58	-173.96	-326.62

表二显示:1992 年后,上海外资实际利用额与上海 GDP 净流出基本呈负相关关系,随着

外资利用规模的扩大,从1994年开始,上海已成为GDP净流入的城市。

GDP的净流入,意味着上海市的市场总需求规模的提高与投资能力的增强。由于其主要由外资导入,通过消费需求的乘数作用和投资的加速数作用,上海总需求中的相当部分,开始脱离了国家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影响。上海经济在90年代中,之所以能在国家推行“软着陆”的宏观需求紧缩中,以不同于全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轨迹运行,并在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缓慢下降通道时,仍连续4年筑起14.1—14.9%之间的高位增长平台,应该说外资进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上海利用外资规模每增加1%,通过带动配套资金等一系列经济运行过程,最终会引致上海GDP增加0.34%。

由于国内外资本的大量投入,上海投资总额高速增长,从1990年的321.9亿元,迅速提高到1996年的1952亿元,年均递增达35%,比同期以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长速度高10个百分点。同时,投资的重点已转向第三产业和工业中能推动技术进步的六大支柱。整个“八五”期间,第三产业获得了投资总额的64%,第二产业仅获得35.3%,使第三产业占上海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31.9%上升到1995年的40.2%和1996年的42%,6年中增加了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新增GDP的贡献从80年代的38%,上升到“八五”时期的44%,第二产业侧依然保持在54—55%之间。推动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主要是金融保险业、商饮和物资供销业及房地产业。在新增第三产业增加值中,金融保险业的贡献5年平均达21.9%,商饮和物资供销业达28.4%,房地产业在1994年前平均仅为7.7%,而到1995年却猛增至24.7%。以上贡献结构,与重点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的方针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当前上海第三产业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与实现“三中心”的目标相距甚远。其内部结构还处于相对不稳定时期,各行业的贡献年度差异较大,增长热点在行业间转移较快,显示出当前第三产业还深受国家的体制和政策的影响,及其服务市场尚不稳定。

在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工业六大支柱开始逐渐成熟,其占工业总值的比重已接近50%。工业结构的调整使工业总产值在“八五”期间的增长速度超过“七五”。90年代上海经济的增长,开始进入第三产业与工业共同推动的时期。同时,由于六大工业支柱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海全社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提高,从1991年的28.69%上升到1996年的38.71%。整个“八五”期间,上海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达114亿元,其中R&D经费达32.6亿元,比“七五”增长了3.2倍和2.2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3.9%。一个具有科技推动且结构互补的经济体系,以其丰富的弹性使之对宏观经济的变化,具有了更强的适应性。由此可见,90年代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导致上海持续增长并不受全国经济波动影响的关键。

二、1998年经济增长预测与经济形势分析

(一)1997年经济增长的形势与主要增长指标估计

前文分析已经表明,90年代后,特别是1992年后,上海经济保持平稳高位增长,并未出现明显的周期波动,尽管GDP增幅出现微幅下调,但很难将其视为进入下降通道。其原因在于上海经济在前5年中,更多地是受投入推动及由此产生的需求拉动的影响。当前期投入增幅降低时,其形成的固定资产已逐步开始进入产出过程,而前期高投入产生的消费效应,仍将在今后以需求拉动的方式来带动增长。考虑到这类微幅下调,主要由第三产业内部主要行业发展的不稳定所引起,工业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的过程中,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上海已进入经济增长

的下降通道。

1997年上半年的上海经济增长状况,可以证明上述论断。今年1—6月,上海GDP增长达13.7%,略高于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今年一季度提高近3.3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带动相当明显,因股票市场成交额大幅上升,使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5%,比1996年末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虽然,1997年上半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5%,投资拉动增长的能力大幅下降,但前5年的高额投资所开始出现的产出回报,部分抵销了上半年投资下降对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到90年代连续多年的投资增长及其积累,我们没有理由对短期投资增长下降及其对增长的影响产生悲观估计。实际上,当期投资对当期GDP的影响,主要反应在当前需求拉动的环节,而其产生的供给能力,则是以后的事。当前,需求已呈现多样化之势,各种需求也会相互替代出现。对GDP瞬间增长来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与证券投资需求拉动是等价的。

今年下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随着一些大项目的启动,将有显著增长。根据我们的预测,全年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50亿元左右,比1996年增加15.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半年将略快于上半年的增长,全年预计将达1340亿元,其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将达14.9%;各类证券的成交量,将为上半年的75%,全年金融保险业增加值预计将达440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19.3%;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3330亿元,比去年增长12.6%;零售价格指数预计将控制在2.8%,消费价格指数将上升5.6%。从指标上看,1997年国民经济运行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虽然,GDP增长率比去年略有下降,但其增长率的边际下降率只有0.5个百分点,比1996年的1.1个百分点缩减了0.6个百分点,出现了收敛的迹象。导致平稳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的实际增长速度与1996年差不多,仅略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但工业增加值预计增幅仅为9.6%,比去年增幅下降0.8个百分点。

(二)1998年主要经济增长指标预测

1998年,全国经济形势将呈现出几方面变化:第一,国家将继续执行以控制通胀为中心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投资作为重要的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手段,将依然成为监控的主要对象。但考虑到今年下半年为完成投资计划而加大投资力度,其联带的加速作用会在明年上半年传递到投资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然而指望明年投资超过20%的增长速度也不现实,20%很可能成为投资增长速度的警戒线。第二,以产权可交易为特征的企业改革,明年将会全面推开,由此会对建立和形成各种类型的资产交易市场产生巨大的需求;对各种类型的交易服务中介机构(如财务、法律、信息),也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现有的证券交易市场,将会以较快的速度扩容。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货币化分房制度的全面推行,其游离出的资金,将会推动和促使现行金融体系的改革,至少将使金融工具的创新提上议事日程。第四,住房制度的改革,将在明年下半年对房产需求的增长及联带消费需求市场产生影响。综上所述,明年全国国民经济的总需求增长,会高于过去两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会高于今年。

上述变化所创造的需求,与上海产业结构所能提供的供给,是比较吻合的,同时再考虑到上海长期增长中的内生动力,根据预测,1998年上海GDP将达到3927亿元,比1997年增长13.3%左右,增幅将略高于1997年;总投资规模将达2413亿元,比1997年增长12.2%。具体参见下表:

表三 1998年上海经济增长主要指标预测结果

	1997年	1998年
1. 总量及产业增长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	3330.9亿	3927.3亿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2.6%	13.3%
第一产业增加值	80.7亿	98.4亿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5.5%	4.7%
第二产业增加值	1783.6亿	1979.1亿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10.8%	9.8%
其中:工业增加值	1608亿	1799.4亿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9.6%	10.6%
第三产业增加值	1466.5亿	1858.8亿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14.6%	16.7%
其中:金融保险业增加值	438.5亿	523.5亿
金融保险业增加增长率	19.3%	13.8%
工业总产值	5847.5亿	6778.9亿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14.9%	15.4%
其中:轻工业总产值	2674.1亿	3106.2亿
轻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14.2%	15.9%
重工业总产值	3173.4亿	3672.7亿
重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15.1%	15.1%

	1997年	1998年
2. 投资与消费		
总投资规模	2150.0亿	2413.0亿
总投资名义增长率	10.1%	12.2%
总消费规模	1464.9亿	1765.4亿
总消费名义增长率	16.9%	20.5%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339.4亿	1572.1亿
社会商品零售名义增长率	15.3%	17.3%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	2.8%	3.9%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	5.6%	6%
GDP平减指数	68.15	70.94
3. 财政与金融		
地方财政收入	337.0亿	402.6亿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16.8%	19.4%
其中:税收收入	324.4亿	395.5亿
税收收入增长率	19.6%	21.9%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2255.3亿	2819.0亿
城乡居民储蓄增长率	20.7%	26.6%

(三)关于1998年主要经济增长预测指标的分析

根据我们的预测,在上海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1998年的GDP增幅将呈现近4年中第一次超过上年增幅的态势。由于上海并没有象全国那样出现明显的下降波动,因而,将这种增幅反弹视为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的起点,也并不恰当。在这里,全国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对上海经济会有一些的带动作用。同时,上海经济体系的内生能量,也在逐渐释放。其主要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地需求的带动。首先,上海已从1994年开始,连续4年出现GDP净流入的局面,据估计,绝对额已超过700亿元。在短期中,其总需求与本地GDP总供给的差额,是由外部供给来平衡的;而在长期中,其差额会成为本地调整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信号。其次,前期累积消费对当期消费和下期消费的传递的作用,使当期或下期GDP的生产,还会受前期消费需求的影响和带动。国际公认的布朗广义相对收入学说证明:当期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而且还取决于以前的消费习惯。据此,我们根据1978—1995年的资料,通过建立模型,得出:前期消费每增加1%,因消费习惯递延,会促使当期消费增加0.55%;同时,收入增加引致的消费,也将在今后6年中产生影响。根据我们的测算,上海城乡居民收入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6189,接近62%。根据模型测算结果估计,这62%的消费中,得到新增收入的当年消费为20%,第二年为13.5%,第三年为9.1%,第四年为6.2%,大约到第六年时累积消费掉56%,剩余6%将会在余下年份中继续发挥微弱的消费影响。考虑到上海在1992年后,职工名义边际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递增,再加上消费习惯的递延,则上海GDP继续保持高位增长就不奇怪了。再次,我们以前期消费与当期投资对当期GDP增长的影响,建立数量估计模型,得出:前期消费每增长1%,引致当期GDP增长0.316%;当期投资每增长1%,引致当期GDP增长0.614%。也就是说,就GDP需求拉动而言,当期投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根据我们的预测,1998年的投资增幅将比1997年略有增加,这可能将是造成GDP增幅微幅上调的原因。

第二、本地供给推动的影响。1998年的供给推动,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大幅提高,其增幅据预测将比1997年高2.1个百分点。由于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业已连续两年高速增长,加上其基数大而将使其增幅有所下降,但商业饮食物资供销业、房地产业、通讯服务、咨询服务,将会增加对第三产业增长的贡献比重。在这里,前些年投入第三产业的巨额投资,将以回报的形式对第三产业的增长作贡献。根据我们对1978年以来的数据样本的分析,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约0.63%。当然,这只是一个直接效果的弹性系数,因第三产业投资所产生的外部正效应,将体现在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率中而难以直接计量。在我们的预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与1997年相比,增幅略有下降,但工业增加值增幅却比1997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影响因素是,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增加值连续几年保持高位增长,其增幅在1998年将大幅下降。据预测,1998年引致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轻工业,重工业产值增长率与1997年持平,而轻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增幅将比1997年高1.7个百分点。

第三、关于物价与就业。1998年,在GDP增长率的增幅出现微幅上升的同时,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将达3.9%,其增幅上升1.1个百分点;消费价格指数将达6%,其增幅上升0.4个百分点;集市贸易价格指数将达5.2%,其增幅上升1个百分点。上述指数共同显示出1998年价格指数有上升的迹象。由于上海的价格指数并不完全由上海内在因素左右,其上升大致可显示出1998年全国总需求在扩张。然而,在价格与总需求上升中,上海的失业率仍有增长之势。根据我们的预测,1998年的失业率增长率仍将达到3.1%,全市职工失业率将达到3.5%,比1997年增加0.16个百分点。在失业率上升的同时,预计1998年居民消费的实际增长率却高达18.1%,其增幅比1997年的增幅还高3个百分点。为此,我们对1981—1995年失业率与实际消费增加额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其两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6302,这至少可表明,失业率并不必然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逆向拉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用该样本资料建立了反映价格与就业率关系的菲利浦曲线估计方程,其得出的估计结论是:物价水平与失业率的正相关竟达0.7082。其经济结论是,在上海,菲利浦曲线的长期效应基本失效。由此可见,在上海,真正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是加速结构调整,而不是等待总需求的扩张。

(孙海鸣系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教授;单位邮编:200433)